

# 格瓦拉日记

DIARIO DE UN COMBATIENTE



CHE GUEVARA

〔古巴〕切·格瓦拉 著 陈皓 译

译林出版社

# 格瓦拉日记

DIARIO DE UN COMBATIENT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瓦拉日记 / (古) 格瓦拉著；陈皓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447-5932-8

I . ①格… II . ①格… ②陈… III . ①格瓦拉， E.  
(1928~1967) —日记 IV . ①K837.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6572号

书 名 格瓦拉日记

作 者 [古巴] 切·格瓦拉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耿江秀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224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5932-8

定 价 3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编者的话

切·格瓦拉（以下简称“切”）的人生道路和个人选择决定了他短暂而丰富的一生。出版切的著作是切·格瓦拉研究中心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学习和传播切作为革命者留给后人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遗产。

这本迄今为止未经任何修改的日记是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从青年时期，他就习惯于以日记这种直接即时的方式来记录下自己的个人生活。有些日记和旅行有关，而包括本书在内的另一些日记，则和他的革命行动有关。这些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们不仅反映了切个人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而且还通过他精炼的思想，反映出古巴武装革命中那段无与伦比的岁月——从1956年12月2日“格拉玛号”登陆古巴，直至1959年1月1日革命胜利。而切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在他看来，也是值得古巴人民去深深铭记的历史。

切本人把这部作品命名为《一个战士的日记》，这是他

以古巴现实、文化、特性和政治现实为基础而慢慢写就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这些在第一时间写下的文字只是主观而不完整的记述，无法展现那段历史的全景，但切对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却无比真实地反映出他在古巴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付出的努力。

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切的文字简明扼要，有时会在字里行间流露些许讽刺的味道。行文既简单又准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记述特别贴近历史事实。他的一些观察和论断，不管旁人认同与否，都随着他本人对古巴了解和研究的不断加深，而越发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切的思想经历过复杂的转变，越来越与自己所捍卫的事业趋向一致。甚至在这样一份如此私人的作品中，除去一些细节外，都看不出他的外国人身份。这是因为切从来都没特别意识到他是个外国人，也不曾比较过什么。而古巴的战士们也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有一次切在山中迷路后重返营地的时候，他从内心感觉到“我受到了大家热情的欢迎……每个同志都热情迎接我归来”。

这些简短的日记，就像切曾经说过的，只是出于个人需要而写下的简单记录，他在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完善和充实这些文字。但是，人们却能从切对军队的生活、战斗，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交火的描写中，从他对牺牲的战友们悲剧性的死亡的描写中，感受到真实的历史气息。而切在《古

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的前言中，也要求所有打算提笔写下自己在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的人们，都要做到“真实”这一条。

切的这些日记本为他后来的那部闻名世界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那本书无疑是切写作风格的里程碑，并标志着他思想政治方面的成熟。尽管这并不是《日记》未能早些出版的原因，却多少对此事产生了影响。因为这牵扯到一部分日记本为何会遗失，以及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档案中为何没有保存全部的日记本的疑问。对于这件事情的说法不一，至今也没能得出明确的解释。尽管在此之前，其他机构已经出版过《日记》的些许片段，但因为这部分原稿的缺失，我们直到现在才决定出版这部作品的全文。

另外，在研究中心的编辑工作中，菲德尔身为革命领导人，本着对“真实的历史事件”的负责态度，急切希望出版他战争回忆录的一部分。尽管《日记》的部分内容如前文所述，是有缺失的，但菲德尔的态度推动了我们去重新考虑将其出版。

为了纠正切在文中的笔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们进行了繁复的校对，并查阅了记录当时人名和地点的大量研究书籍。特别是最初阶段的一些日记，因为作者对文中某些事发地点的地理位置还不甚熟悉，导致错误颇多。另外，日记中对某些战士的名字以及某些日期的记录也都有错误之处。

尽管这本日记的第一版中还可能存在其他未能指明的错误，日记的一些重要章节也有缺失（这些都对后来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我们还是希望书中的记录和历史文稿能够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参考资料，也希望此书能够激励那些希望以现代视角去探求那段英雄历程的真实意义的人们。这段历程始于 1956 年 12 月 5 日（切在他的文章《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中把那天的战斗形容为“战火中的严峻考验”），终于古巴革命胜利前夕的 1958 年 5 月 26 日。那一天，菲德尔在一份关于拉斯梅塞德斯地区的战报中写道：“所有已经牺牲的和正在牺牲的同志们，都将在革命理想中得到永生。”

切·格瓦拉研究中心

哈瓦那

## 序言 切：山区与平原

本书的读者们将会看到，切·格瓦拉不但具备英雄主义和为拯救全人类而献身的精神，也拥有高超的智慧。如此天赋使他能够详细地描述出那些经常被他人忽视或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细节。他以无限的真诚（这样的真诚，只有那些可以彻底接受真理和正义的杰出灵魂才会具有的无限慷慨和团结精神，才能与其媲美）把所有，或者几乎所有从他那锋利而缜密的头脑中经过的事情，都记录了下来。

我们应该感谢这位出生在阿根廷的古巴人，他以这种方式度过了作为游击队员的一生。在我们即将经历的未来，以及在那个更遥远的，属于后来人的二十一世纪中后期，人们依旧能够通过他的生平去了解和津津乐道于那些新古巴建国时代在奥连特省群山中发生的曲折往事。这个崭新的古巴诞生于一段悠久的历史，这历史充满了玻利瓦尔和何塞·马蒂的荣光。

有些传记作者对切的认识是偏颇的。他们在很多事件上都随心所欲，他们隐藏了细节，或者只是歪曲了它们。因此，

他们笔下的切成了一个漫画般的形象，存在于一段只能用智慧和热爱去形容的过去。当这些作者无法把握住事情的两面的时候，他们就会错过精髓，以至于失去了弘扬这段历史最为崇高和关键之处的荣幸，以及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我曾经战斗在古巴革命的中心地带<sup>①</sup>，切则在游击战壕里用日记描述了这场革命。二者之间那最私密、最矛盾和最具活力的关系，已成为我生命中深入骨髓的一部分，并铭刻在我的心底。像我们这样活过，并且热爱着那段往事的人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就不会在事实的迷宫中偏离方向，也不会被带有倾向性的解读所误导。我们渴望揭示出最本质的东西。

在这本日记中记录了——以切在当时的视角来看——山区和平原革命者们的矛盾分歧，而我自己作为城市地下工作者，也有幸置身其中。这些植根于古巴革命酝酿过程中的事件，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而切正是这场革命的伟大缔造者之一，他与菲德尔和劳尔一起，站在革命的最高处。

切·格瓦拉研究中心邀请我来为这本日记写一点文字，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荣誉和个人幸福。大家都知道我本人与这位游击司令笔下的某些事情和看法的关系。将我心中的成熟想法以一种恰当而有益的方式表达出来，需要付出复杂而艰

---

<sup>①</sup> 指城市，即后文的“平原”。作者是古巴革命时期城市地下斗争的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不能，也不应该逃避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真相，我必须把这些真相公之于众，以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切的伟大，菲德尔的独创性，以及古巴革命的某些精华所在。

在拙作《冲击》一书中，我提到过一件小事，它对理解我现在所说的话至关重要。在那本书中我这样写道：

[…]尽管出于安全考虑，应该把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文件，通过不同渠道送到游击队那里，但我们还是携带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文件和照片。结果，这些资料被独裁警察没收了，并被巴蒂斯塔政府利用。

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份我写给切的信件草稿。我曾给菲德尔读过这封信，他让我不要寄出去。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很不合适地将此信放进那些资料中保存下来。想到自己把这封信带在身边，并给菲德尔和劳尔引来了麻烦，我总是非常自责。<sup>①</sup>

关于切对某些平原革命领导人的看法，我在信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有关。那个时候，切已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我们这些“平

---

<sup>①</sup> 1957年底，作者前往马埃斯特拉山区向游击队领导人汇报有关《迈阿密协议》的情况，后来被捕。当时身边携带的珍贵资料，包括这封信，都被反动政府没收了。此信后来被巴蒂斯塔军发表用作反动宣传。——译者注

原革命者”中的很多人，却尚在成型阶段，免不了会抱有矛盾和怀疑。

同时，当评价一场解放国家的革命，以及革命者的出身和地位的时候，那些不符合古巴国情和历史的观念，始终从国际层面上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思想。

而此事的关键在于，菲德尔的天才使得古巴革命（切是它的伟大领导人之一）超越了此类争论而顺利发展。我们一边在共同的探讨中推进革命进程，一边将争议的根源抛到身后。

一月革命胜利后几个月，切就以出众的才华，比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更准确地理解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问题根源，以及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并运用第三世界和拉丁美洲的经验在理论上对其加以丰富的方法。

从1959年起，切最重要的合作者中，就包括曾在平原革命斗争中肩负重大责任的同志们。

这些细枝末节的分歧，从未影响过我们每个人对切的尊敬。正相反，他的威信与日俱增，最终成为世界革命斗争的最高象征之一。

我记得，当我那封信被巴蒂斯塔政府军发表后，一位在古巴圣地亚哥市美国领事馆工作的外交官

(“七二六”运动组织与他有些联系)曾去问过海蒂<sup>①</sup>:“玛利亚,哈辛多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后者为了安慰他,回答道:“但是,如果攻击斯大林……”当时这位美国人向她指出:“你要注意,这不是这封信的根本所在……”[...]<sup>②</sup>

现在,我将被巴蒂斯塔军发表的这封信件的原文眷录如下:

马埃斯特拉山区, 1957年12月25日

我尊敬的切:

这是我在收到你给丹尼尔的信以及他回信的副本后给你写的第二封信。前些日子我一次都没去看过你,这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遗憾。但是,请相信我,我们这里有数以千计的事情要处理,而我这次外出是必不可少的。

我确信,只要我们谈一次话,上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算你对于我们那些形如教条,无论是出于

---

① 海蒂,指作者的妻子海蒂·桑塔玛利亚,她也是一位革命者。玛利亚和哈辛多分别是对作者夫妇的昵称。——译者注

② 阿曼多·哈特·达瓦罗:《冲击》,古巴文学出版社,哈瓦那,1997年,第151至153页。

私心还是出于公义的担心，也都不成问题。

是的，我必须告诉你，你对我们不但粗暴，而且不公。如果你认为我们都是右翼分子，出身克里奥尔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就是他们的代表，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更不会感到丝毫痛苦，因为你这种想法与你对苏联革命历史进程的理解如出一辙。总而言之，对于我们来说，除了进行这场小小的民族革命之外别无他法。世界无产阶级导师们将1917年那场可怕的战争变成了一次先入为主的民族主义革命，变成了一种对俄国人来讲非常合法的东西，变成了一场反对封建沙皇的解放运动。但是，对于俄国之外的人民，他们却不给我们进行国际革命的机会，可这场革命在如今看来是势在必行的。

所有这一切的致命之处在于，斯大林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德国人，所以，他脱离不了俄国统治者的局限。如果他出生在巴黎，或许就可以用一种更加宽阔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我重申一遍，所有这些都错不在我们，而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真正天才们缺乏政治能力去认识到这一点。

真正让我有些生气的是，你不理解我们面对一份必须拒绝的协议所持有的态度。等我一到圣地亚哥，就把所有与此有关的文件寄给你。我想告诉你，亲爱

的切，如果说，我对国际革命政治持有异见的话，对于我们国家自己的革命，我却能跻身于政治觉悟最彻底的人群之列。

我们拒绝了那份协议，并要求我们的底线必须得到满足。我们没有公开此事，并不是因为当时这样做会引起混乱，而是因为我们希望等到此事完全确定下来之后，再与菲德尔协商公开拒绝的事情。当得知菲德尔公开提出的建议和我们如出一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当得知马埃斯特拉山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劳尔·奇巴斯在迈阿密表示，我们的提议和他想的一样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当我们看到，当“小资产阶级的左翼领导人”<sup>①</sup>和你心目中我们这种真正的小资产阶级之间达成了完全共识时，我们是多么高兴！

是的，我想告诉你，我对自己被看做小资产阶级深感欣慰。我很平静，我知道，这些说法影响不到自己[...]我已经开始努力组织工人们，他们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走错了道路，请你向我们指出一条更正确的[...]

我尊敬你

哈辛多

---

① 此处指菲德尔·卡斯特罗。——译者注

就像前文所提及的那样，我们中的很多人思想尚在成熟阶段，免不了会对社会主义存在“偏见”。而可悲的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官方批判<sup>①</sup>，把我们的那些偏见变成了现实。但那些批判并未涉及问题的核心。就在那些年，在匈牙利还发生了著名的苏联坦克入侵事件。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山区的时候，菲德尔劝告过我，不要将这封信送给格瓦拉少校。当时我们都同意这样做。但是政府军公布了这封信，而切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将它写下来是为了表明，尽管我们之间存在过分歧，但对于切这位在墨西哥与菲德尔会合，乘坐“格拉玛号”登陆，并成为古巴历史上最杰出的英雄之一的阿根廷人，我们未曾减少过丝毫对他的钦佩之情。

今天，我可以肯定地对本书的读者们说，切在当时提到或认为的那些包括我在内的非共产主义者（他这么想有一定道理），始终与菲德尔并肩站在社会主义革命战线上。有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也一定会和我一样站在这条战线上<sup>②</sup>。

这些人中就有雷内·拉莫斯·拉图尔（丹尼尔）。他是平原革命运动最为坚定忠诚的领导人。他于1958年7月30

---

① 此处指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译者注

② 卡洛斯·弗朗基除外，他在那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日倒在战场上。切在日记中感人地写到：

[…]我和雷内·拉莫斯之间有着深刻的思想分歧，我们是政敌。但是，他牺牲在战场上，在第一线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能这样牺牲是源于一种内在的动力。我曾经不认为他有，但现在，我改正自己的观点[…]

正是这种“内在的动力”成就了切和丹尼尔的伟大。他们跨越了政治上的分歧，在更久远的历史中团结在一起。

在古巴，我们这些身处争论中心的人，最终都衷心接受了社会主义观点。我们热爱切，他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以上的分析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菲德尔事业的独特性。而平原和山区那些坚定革命者们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美洲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坚不可摧的团结。我们希望，这一点可以成为后世的榜样。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加速了二十世纪这代人的极端主义思想，那就是帝国主义。从1931年至1958年12月，巴蒂斯塔一直都是帝国主义在古巴强有力的代言人。五十年代，他在古巴的街头、监狱和农村犯下了无数罪行，却一直受到保护。这是维护美国利益的保障。自从这个恶贯满盈的独裁者通过“三月十日政变”非法上台之后，美帝国主义就为支持他竭尽了全力。

那个时候，切并不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对它的历史也不像几个月之后那么熟悉。彼时他刚开始慢慢了解古巴，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通过文化，也通过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正义感，慢慢地了解社会主义。

以上内容在切的日记里都有提及。多年以后，在这本日记即将出版之际，我怀着沧桑过后的平静和对古巴游击队员们的敬意，有义务指出来，以上这些并不是平原和山区革命者们唯一的分歧所在。

这些分歧产生于变革和务实的背景下，体现在山区和平原的革命者们在斗争方式的选择上。山区的游击队员们渐渐形成了他们的战斗理念，并迎来了胜利；而在我们这些城市里的革命者们中则慢慢产生了另一种想法，于是我们组织了4月9日大罢工，同样取得了成功。

这两条斗争道路各自独立行动，都取得了胜利。而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群众的武装斗争，革命总罢工，“七二六”运动组织和菲德尔无可争议的领导，共同构成了古巴革命的基础。

在无法用政治手段直接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美洲人民历史性地意识到，斗争并在必要时为理想献身，成为激励后人的典范，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大家（切是我们最伟大的代表）都明白，为最崇高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战斗并牺牲，这样的榜样会具有多大的历史价值。